

[美] 约翰·麦克菲——著 / 李雪顺——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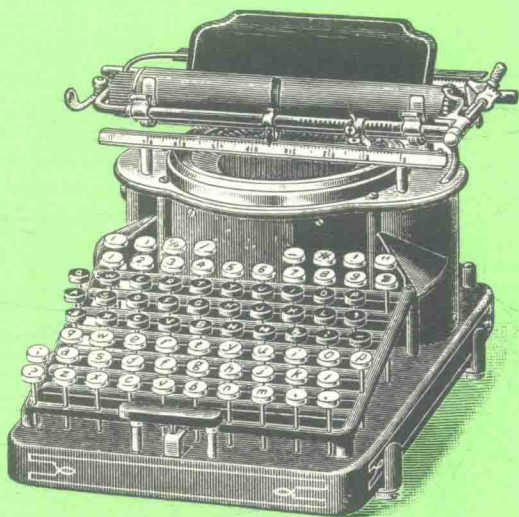
写作这门手艺

普林斯顿大学写作课

Draft No. 4

John McPhee

On the Writing Process



艺术存在于你有所发现的地方。
你有所发现的地方，就会有好的写作。

美国书评人协会终身成就奖、普利策奖得主，
公开讲述普林斯顿大学四十余年的写作课程。

授课四十余年，其学生活跃于美国文坛；
既有普利策奖得主，也有《寻路中国》作者彼得·海斯勒。

南文艺出版社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 约翰·麦克菲——著 / 李雪顺——译

写作这门手艺

普林斯顿大学写作课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作这门手艺 / (美) 约翰·麦克菲 (John McPhee)
著; 李雪顺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8
书名原文: Draft No.4: On the Writing Process
ISBN 978-7-5404-8799-7

I. ①写… II. ①约… ②李… III. ①写作-方法
IV. ①H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1667号

DRAFT NO.4: On the Writing Process by John McPhee
Copyright © 2017 by John McPhe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8-142

写作这门手艺

XIEZUO ZHE MEN SHOUYI

作者 [美] 约翰·麦克菲
译者 李雪顺
出版人 曾赛丰
出品人 陈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刘诗哲
封面设计 曾国展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印刷 河北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4千字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4-8799-7 定价: 56.00元

Draft No.4
John McPhee
On the Writing Process

献给戈登·冈德，
他看完了整本书；
献给尤兰达·惠特曼，
她一字不漏地看完了整本书；
献给普林斯顿大学的五百余名大学生，
他们曾完整听过这本书中的所有内容。

001	进程
017	结构
071	编辑及出版人
106	引导
136	参照系
153	检验点
188	第四稿
213	省略
233	作者说明

进 程

Progression

A B C

D

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工作地点是一套出租屋，位于纳索大街，上几步台阶就到，楼下是验光师内森·凯斯瑞尔的店铺。大街对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主图书馆。过道对面，是那家瑞典按摩店。店主是一对奥地利夫妇，年近退休，在此开店已有数十年之久，做的是合法生意。对下至大学里的橄榄球运动员，上至罹患关节炎的老年人，他们都提供按摩，没有性服务。不过，在那个时代，按摩已经成为性的同义词。傍晚的多数时间，为抛开写作，我会俯视窗外不断掠过的场景。我会看见，一个个

身着西装的男人停下脚步，犹豫不定，先是四处张望，接着便走向台阶底下那扇玻璃门。后来，两个奥地利人不得不刮去门上的“瑞典按摩”字样，换上一块挂式标牌，晚间回家时再摘下来。此时，不断有男人爬上台阶，但两扇门上没有任何标识。他们敲响我的房门，我打开门；本盼着体态丰满的瑞典女郎，结果出现的是身材矮小、满脸胡须的大男人，他们一个个脸色骤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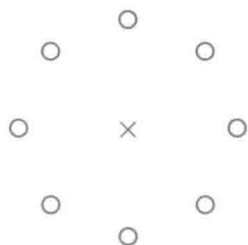
在此环境下，我写了三篇互有关联的文章，后编辑为《与荒原同行》(*Encounters with the Archdruid*)。长期以来，我把一张纸钉到一块告示牌上，用大写字母写上“ABC/D”。这几个字母代表一篇文章的结构；它们被钉到墙壁上时，我并不知道，主题会是什么，ABC将代表哪几个人，更不清楚D这个分母将会是谁。不过，确定无疑的，它们都将是真实的人，将在某个真实的地方碰面。但在一开始，其他的一切都十分抽象。

我来告诉你，那绝不是一个写作项目的开始。一开始要做的，是确定主题和收集材料，并以此为起点，进行结构的安排。你先摆上一大堆笔记，接着就要琢磨，用这堆笔记来做点什么，绝不是反其道而行之。1846年，埃德加·爱伦·坡在《格雷厄姆杂志》上发表了《写作的哲学》，描述了《乌鸦》这首诗的几个构思阶段和最终写作过程。一开始，想法总是很抽象。他想写点调子沉郁、忧伤、哀婉，且饱含幽怨的东西，但他并不知道那究竟会是什么东西。他觉得，其中要有重复，而

且是单字重复。他自问，哪个元音能达到最佳目的？他选了长元音的“o”。与什么样的辅音搭配，才能拉长沉闷和哀婉的调子？他选中了“r”。元音、辅音分别是“o”“r”。传说。心窝。门砾。莱诺。乌鸦说：“不再啰。”他说，自己头脑里首先想到的词语其实就是“不再啰”。这篇文章有多少冷峻真相，全在读者自己的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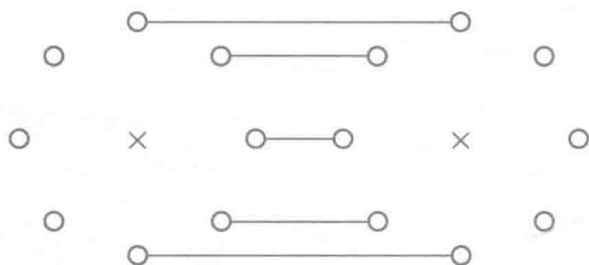
不过，我把“ABC/D”钉到墙壁上的做法与之相似。十多年来，我先在《时代》杂志，后在《纽约客》，一直从事人物描写。从定义便可知道，每一篇文章都刻画一个人物。在《时代》杂志期间，我为演艺界人士（理查德·伯顿、索菲亚·罗兰、芭芭拉·史翠珊等等）写过无数人物随笔，篇幅长短不一；在为《纽约客》撰稿期间，我替运动员、校长、历史学家、野生食品专家写过更长的人物随笔。这样的工作干了十多年后，我急于有所长进，或者，至少摆脱有可能成为陈规的套路。

在给某人写一篇人物随笔时，记者的艰辛努力看起来大致如下图所示：



×是你将主要与之展开交谈、打发时间、进行观察，并加以描写的人。○代表外围面谈，面谈的人越多越好，比如她的友人，他的母亲、旧日良师、队友、同事、雇员、敌人，或者任何人；他们都能对×这个人的生活 and 职业提供一些线索。若干个○堆叠累加，从而提供一种三角验证，对各个事实加以印证，并去伪存真。马克·辛格和布洛克·布劳尔等作家说过，当你发现自己正反其道而行之时，你就会明白，自己已经做过了足够多的外围采访。

因此，如上所述，十多年之后，我感觉自己已经受到这种形式的局限，便开始考虑写一篇双人随笔，所采用的方式如下图所示：



在两边形成呼应的过程中，有可能生成新的维度。也许我会有两次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四次。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无论如何，一加一应该大于二。

那么，写谁？写哪两个人？我想到了不同的组合：演员和导演、棒球手和球队经理、舞蹈家和编舞者、著名的建筑

师和功成名就的老顽固客户， $1+1=2.6$ 。我还是拿不定主意。一天，我碰巧看到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转播的首届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半决赛。两个美国人正展开对决，一个 25 岁，另一个 24 岁。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一个成长于里士满市中心的球场边，另一个成长于克利夫兰市郊温布尔顿路上的顶级富人区。他们本可以自 11 岁起就相互认识，因为跟他们一般水平的网球手如此罕见，而且供他们展开拼搏的地点遍布全美。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考虑这样的组合，以及它的各种可能性。我最终决定，试着写一篇双人随笔，以这场比赛框定这个故事的内容和结构。如果拿不到 CBS 的录像带，我将一事无成。在当时，录像资料还没有归档一说。带子都是重复使用。拷贝出来的东西叫作显像管录像，也就是一卷对着电视屏幕录制的 16 毫米录影带。我问《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可否出钱买下这卷录像带。“很好，”他边叹息边说道，“去做吧。”我给 CBS 打去电话。一个家伙说道：“你要晚打来一分钟都迟了。按照计划，那盘带子将在今天下午被抹掉。”

写毕《比赛水平》（*Levels of the Game*）这篇双人随笔，我的愿望是进入一种跳跃模式。如果两个人能够写成，干吗不通过一篇复杂的文章写一下四个人？正是在此时，我在告示牌上钉上了几个大写字母。A、B 和 C 将会彼此分离，单独与 D 产生联系，是的，可这些人会是谁呢？正如结果所示，我唯一

做过的，便是此刻描述的两个项目——一是 $1+1=2.6$ ，二是 ABC/D——在寻找主题的开始阶段都是些抽象短语。乌鸦说：“不再啰。”与此同时，我始终找不到适合四人随笔的主题。写什么呢？

正如我在文集《裸露》(*Outcroppings*)的序言中(以及别处)提到的那样，关于主题选择的普遍问题是，多种可能性同时并存，为什么选这个，而不选别的？对写真实人物和真实地点有兴趣的人，为什么选择某些人物、某些地方进行写作？对非虚构写作项目而言，思路比比皆是，永不枯竭。要把一种思路变成一篇文章，你可能需要花上一个月、十个月，或者好几年的时间，是什么在操控你的选择过程？我曾经把自己大约二十甚至三十年间写过的全部文章列了一个表，再把其中跟自己上大学前的兴趣相关的篇目标示出来。标示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

我父亲是个医生，专事普林斯顿大学运动员的伤情处理。他也作为美国奥运会代表队首席队医几次周游世界。我很小的时候，他在佛蒙特州的儿童营担任医生，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夏日。儿童营名叫凯威汀，是一个林间教室，会专门讲授独木舟旅行，还教授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而这个词在当时还意味着共享植物的根冠关系。从6岁到20岁，我在这里长大成人，最终成为了独木舟旅行的领队。我在那里打过篮球和网球。在家乡的高中队打球期间，我丝毫没想到，自己正在为今

后的文章创作搭建骨架。在整年的野外独木舟旅行期间，我都梦想着——当然不是想象——旅途终会通往布鲁克斯岭、育空-塔纳纳存疑岩层、内华达州的船形山梁、怀俄明州的拉拉米山脉，或者在 C/D 的陪伴下通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激越水流。

20 世纪 60 年代，环保运动正处于初期，我觉得那可以成为 ABC/D 关系式的主题，也就是让一位环保主义者与三个大自然的敌人展开斗争。说起来容易，安排起来困难。我仍然没有一点概念，谁将成为这些人。实际上，就算这些人的名字奇迹般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根本认不出来。我前往华盛顿求援，一位名叫约翰·考夫曼的友人曾经与我一起担任教职，此时正在国家公园管理局担任规划师。他的研究成果包括科德角国家海滨公园和北极之门国家公园等公园系统的组成部分。跟他的几位同事和朋友一道，我们首先给 D 的可能性列出了一个单子。我们列的第一位就是已故的奥尔多·利奥波德，他被称为“野生生物之父”，他的《沙乡年鉴》已卖出两百多万册；但一如同时代的其他环保先驱者，如果面对一位格外易怒的人，他的表现也会显得过于理智。考夫曼等人把塞拉俱乐部¹的董事长戴维·布劳尔描述成一个精力充沛、无所畏惧、头脑

1 塞拉俱乐部 (Sierra Club)，美国的一个环保组织，由著名的环保主义者约翰·缪尔于 1892 年 5 月 28 日在旧金山创办。塞拉俱乐部拥有百万会员，分会遍布美国，且与加拿大塞拉俱乐部有着紧密的联系。——译者注。下同。

简单的人，头顶颤颤白发，有如一位精通《摩西五经》的先知。他的电话区号是415。我给他打了电话。几天之后，他回拨给我，说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与此同时，A、B和C——也就是大自然的三个敌人——的确认比挑选更加简单；在从布劳尔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就列出了一份十七人的名单。几个月后，名单缩减到三个人，其中有美国垦务局局长弗洛伊德·多米尼。他修建了庞大的西部水坝群，而他本身就是个十分倔强的西部人。作为怀俄明州年轻的农技专家，他帮助牧场主战胜过一次又一次干旱，因此对筑坝蓄水的做法深信不疑。从亚利桑那州到阿拉斯加州，就坝址选择而言，他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与戴维·布劳尔针锋相对，而布劳尔往往胜他一筹。多米尼视布劳尔为“自私的环保主义者”。早年在对多米尼的一次采访中，在他位于内政部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说：“戴维·布劳尔讨厌我的胆大，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够胆。”在最后写成的文章中，随着那一席对话渐渐展开，多米尼接着说道：

“我没法跟布劳尔说话，因为这个人他妈的太可笑了。我甚至没办法跟他这个人讲道理。我在芝加哥跟他有过一次争论，他怕得浑身直打哆嗦。有一次，在国会山开完听证会，我指责他歪曲事实，他说：‘就爱情与战争而言，一切都是公平的。’天啊。还有一次，也是在开完听证会后，我告诉他，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些什

么。我还说，希望自己能把有些东西给他展示一下。我本希望他找个时间跟我来一趟大峡谷，可他说：“行啊，记着吧，也许我会的。”我在谢南多的农场有一头公牛，它老让我想起戴维·布劳尔。两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们始终没法把它套上开往市场的卡车。那个狗家伙喜欢独来独往，谁都没法把它赶进畜栏。他娘的上了卡车，竟然弄坏滑槽，溜掉了。我只好把它拴起来，就在农场上宰了它。我一枪射进它的脑袋，亲自结果了它。只有用这种办法，我才能结果那个龟孙子。”

“局长，”我问道，“要是戴维·布劳尔上了皮划艇，顺科罗拉多河而下，你也会坐上去吗？”

“没问题，”他回答道。“肯定。”

C加D，然后——那就是《与荒原同行》的一般性思路。有了A和B（采矿地质学家查尔斯·帕克和度假村开发商查尔斯·弗雷泽），分三部分撰写的四人随笔，所达到的效果跟1+1并无二致。于是，我大着胆子进入一种指数级病理状态，开始构思一个六人随笔系列，其中的第七人将在第一部分作为次要人物出现。在第二部分再次出现时，他的维度略有增加。在第三、四、五、六部分出现时，渐次增加。在每个部分出现时，与中心人物相比，他的比例都略逊一筹。直至第七部分，也就是在最后一篇随笔中，他才成为中心人物。然而，面对这一空想式架构，

我有些退缩，一如肖恩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建议我了解一下，在纽约开办医院都有哪些花费（从邦迪创可贴到尿盆等巨细无遗）时，我同样打了退堂鼓。蒂娜·布朗担任《纽约客》编辑的第一年就提出建议，让我把正在写作的文章放一放，转写一篇有关直布罗陀海峡谋杀案的文章。我表示了异议。那是在半个世纪里，《纽约客》分派给我的仅有的两次任务。

读者不会羞于提出建议，而且建议往往提得很好，但与作者相比，它更接近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一位名叫安迪·切斯的海员从一艘油轮的甲板上给我来信，讲述美国商船协会的严重衰落，并详细描述它在当下和过去所具有的重要性。无聊。他接着写道，他很确定我不会去关心美国商船的命运，不过，我要是能乘坐美国商船进入茫茫大海，一定会遇到几个喜欢开口说话的人物，从而愿意把这些人拿来写一写。等他回到岸上时，我来到缅因州，去他家里做了拜访，并整天整天地做着笔记。没过多久，为找到一艘船，我和他就先后造访了位于纽约、查尔斯顿和萨凡纳的工会大厅。《寻船记》(*Looking for a Ship*)发表后，一个卡车司机给我来信。这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拥有一辆化学品运输车。他写道：“你既然能跟那些人一起出海，就应该能跟我们一起上路。”我回复说：“你是做什么的？”趁着槽罐车内部清洗的空档，他用拍纸簿写了满满七大页，说明自己载着什么，前往什么地方。我与他通了五年的信，可一次也没见到过他；直到有一天，我在佐治亚州才坐上

了他开的卡车。他当即告诉我：“噢，现在估计不顶用了。如果不行，你只管告诉我，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路上途经任何一个机场，我都可以把你放下。”我在塔科马下了车。一辈子都在收到普通读者寄来的良好建议，只有这两件我付诸了实践。

思路要靠找，与此同时，约翰·考夫曼还源源不断地把它们喂给我，就好像在制作鹅肝酱一样。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长大，在那里乘坐独木舟度过了一个个夏天，因此我们之间有着很多共同兴趣。我写过的书里面，约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要全部或者部分归功于他提出的思路，如《与荒原同行》《树皮独木舟的逃生》(*The Survival of the Bark Canoe*)《进入该国》(*Coming into the Country*)等等。然而，还不止于此，一篇文章能够催生另一篇文章，仿佛一条条根茎，穿过地下，去寻找彼此的关联。这样的进程一旦启动，就会像线团那样，出人意料地四散滚落，最终停留的地方，往往超乎预料。

1969年，是我与戴维·布劳尔一起度过的一年。一天，他离开位于伯克利的红杉房屋，往北飞到尤里卡，抵达红杉国家公园，参加了伯德·约翰逊夫人林¹的献礼仪式。他带着我一同前往。在多荫而浑圆的树木之间，我们沿着一条铺满红杉碎屑的新建车道蹒跚着。不时有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慢驶过。特工人员身着黑色西服，跟在车的两边往前走。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在一

1 红杉国家公园的一处著名景点。